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Freiheit, Gleichheit, Sterblichkeit, Philosophie nach Heidegger

汉斯·艾伯林 (Hans Ebeling) 著 蒋芒 张宪 译

自由、平等、必死性

——海德格尔以后的哲学



自由、平等、必死性

——海德格尔以后的哲学

Freiheit, Gleichheit, Sterblichkeit, Philosophie nach Heidegger

汉斯·艾伯林 (Hans Ebeling) 著

蒋芒 张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平等、必死性——海德格尔以后的哲学/[德]艾伯林著;蒋芒,张宪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ISBN 7-5617-4916-3

I. 自... II. ①艾...②蒋...③张...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2383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万 骏

封面设计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6-648 号

六点学术

自由、平等、必死性

——海德格尔以后的哲学

[德] 汉斯·艾伯林 著

蒋芒 张宪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周一民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5617-4916-3/B·274
定 价 1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作者简介

汉斯·艾伯林(Hans Ebeling),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39年出生于德国的布朗茨维格,在吕内堡的荒郊长大成人。他在弗莱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期间,受到海德格尔、布洛赫(Ernst Bloch)、芬克(Eugen Fink)、舒尔兹(Walter Schulz)等哲学大师的指导,现任帕德邦大学哲学教授,著有《论向死的自由》、《理想的感性之维——康德的理性事实以及行动的虚构基础》、《碰机会的主体——法则、座架、脚手架》、《厄运——第一哲学》等书。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真诚、坚定的哲学著作,它从不同的重要方面清理了海德格尔的哲学遗产,使之接上欧洲的文化传统,并对其有所更新,我们从艾柏林的分析中可以把握到欧洲当代哲学的大致走势,更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窥见一个欧洲哲学家对保留自己哲学文化传统遗产的真挚情怀。正如艾柏林自己所言,尽管事实上我们不自由,我们不平等,我们肯定要死的,但是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平等,我们不要光为了死。人类行动的理想感性就是如此,以所有的灾难和通过所有的灾难去肩负起人类的远大抱负。人类需要哲学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排除来自所谓现实的全部阻挠而贯彻自由、平等以及倾向于消除必死性。

● 六点学术

自由、平等、必死性——海德格尔以后的哲学
汉斯·艾伯林 著

诗学与时间
刘光耀 著

普罗提诺论恶——《九章集》一卷八章解释
张映伟 著

原罪与正义
刘宗坤 著

王夫之的政治诗学
张辉 著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
戴从容 著

先秦阅读史
李若晖 著

基督信仰的历史起源
池凤桐 著

圣经的叙事艺术
西蒙·巴埃弗拉特 著

麦芒上的圣言
吴飞 著

城邦人的遐想
胡不归 著

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
张荣明 著

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
伊凡·休伊特 著

特约编辑／万 骏

装帧设计／吴正亚

www.vihorae.com

出版说明

自从有了康德,据说德国哲学便带上了这样一个烙印:喜欢创建形而上学体系。国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特别的渊源,是否能搞出个什么体系出来,一度也成为学界中人衡量“人物”的尺度——当然,如今谁还要如此去衡量别人,只有丢份了。

尼采一脚踢开搞形而上学体系的前辈们,似乎要直接承继古典希腊哲学的余绪,其条文体写作据说就是故意与形而上学论文体作对。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这样的大智慧最终仍然免不了要去搞一套形而上学(证据据说是其遗稿《权力意志》)。非常有意思的是,海德格尔似乎比尼采更为旗帜鲜明地要终结德国形而上学,回归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西方智慧,但也难免要来构想一套形而上学——即便这套形而上学显得是回到西方智慧的源头重起炉灶搞出来的。如果说尼采反形而上学却搞了形而上学,那是无意为之,那么,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又搞形而上学则是刻意为之。

从海德格尔的一生著述中大致可以见到两个大方向：1. 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从早年的《存在与时间》到晚年的 *Ereignis*）；2. 重新解释传统。倘若如此，问题随之而是：这两个大方向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清楚，第二个大方向明显是为第一个大方向作准备的。具体而言，对“传统”的解释可以分为：1. 通过解构性解读拆除（海德格尔眼中的）西方形而上学旧传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谢林—尼采），2. 通过建构性解读竖立起（海德格尔自己心目中的）西方形而上学新传统（前苏格拉底哲人—索福克勒斯—荷尔德林—近现代德语诗人）。有意思的是，海德格尔亲炙过的学生，大多看重且非常受惠於其第二个大方向——重新解读传统（尤其解构性解读），而非第一个大方向——建构新形而上学；相反，海德格尔的门外学徒则大多对他的第二类著述——新形而上学入迷。

对哲学有热情的，大多难免会热爱上一阵子海德格尔。当然，热爱海德格尔的哪个方向，看来像是有讲究的。本书作者 *Ebeling* 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Reclam* 出版社出过他不少书。在本书中，作者把海德格尔放到德国哲学史——或者说德意志形而上学史的枢纽位置上来思考，或者说，从海德格尔的新形而上学出发来思考此前和此后的德语哲人，从而为我们的德国哲学的爱好者们设下了一个看不见的圆圈。

本书是笔者在 80 年代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持的《新知文库》组译的选题，编委会失散时，本译稿连同笔者组译的其余十多部译稿由编委会交托专人保管——近二十年来，不少译者找我索回译稿（比如郭明达教授译的《西方芭蕾舞简史》、方珊教授译的《雅可布森文选》、罗梯伦教授译的《新康德主义文选》、林克教授译的《特拉克尔传》等等，包括本人选编和组译的《海德格尔诗学文选》），我则

不断向译稿保管人索要,始终不了了之。现在看来是无从索回了,只能向各位相关译者深表歉意。

本译稿幸而译者手里还存有一份初稿,译者十多年后找上我,说虽早已不搞旧业,仍然希望译稿能够出版。衷心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宪教授,他受我委托根据蒋芒先生十多年前的初稿修译出这个本子,算是对 80 年代的一位合作者有了个交待。

刘小枫

2006 年 7 月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中译本前言

艾柏林(Hans Ebeling, 1939—)与其兄长格哈德·艾伯林(Gerhard Ebeling)都是当今德国学术界思想颇为独特的学者。如果说,格哈德·艾伯林的主要贡献在基督教神学解释学的话,那么,汉斯·艾柏林则专长于主体性理论、伦理学、法哲学和现代性理论等研究领域。今天的德国哲学界可说是五彩纷呈、群星璀璨,哲学任何一个领域都不难举列出国人所熟悉的领军人物。相对来说,汉斯·艾柏林对于汉语学术界至今还是生面孔。然而,我相信,他的名字不久会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因为,他对海德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重新梳理与整合这样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艾柏林 1939 年生于德国的布朗茨维格(Braunschweig),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吕内堡(Lueneburger)度过。1959 年至 1967 年,他分别在弗莱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哲学、教育学、拉丁语源学和希腊语源学。期间,他在学业上特别受到海德格

尔、布洛赫(Ernst Bloch)、芬克(Eugen Fink)、舒尔兹(Walter Schulz)等哲学大师的指导,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广泛而又坚实的基础。

艾柏林于1967年以题为《论向死的自由》(*Ueber Freiheit zum Tode*)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大学里当助教(Wissenschaftlicher Assistent)。1970年至1976年,他分别受聘于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代理讲座教职(Lehrbeauftragter)。他在1975年获得大学讲师资格(Habilitation),随即被聘为大学讲师(Privatdozent)。两年后,他又分别在柏林自由大学主持威舍德尔(Wilhelm Weischedel)讲座,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主持阿佩尔(Karl-Otto Apel)讲座。他在1981年正式成为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一年后转到帕德邦大学(Universitaet Paderborn)接任奥尔穆勒(Willi Oelmueller)教授的教职至今。

艾柏林自1967年发表博士论文《论向死的自由》(*Ueber Freiheit zum Tode*, Diss. Freiburg i. Br. 1967)以来,在三十多年的哲学教职生涯中,共出版专著近十部,论文上百篇,主编、合编论文集多部,内容广泛涉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政治哲学和死亡哲学。笔者就兴趣所至,挑选与《自由、平等、必死性——海德格尔之后的哲学》有关的部分著述,为中国读者作一粗浅的介绍,使其阅读有一个较为广阔的文本空间。

首先是《理想的感性之维——康德的理性事实以及行动的虚构基础》(*Die ideale Sinndimension, Kants Faktum der Vernunft und die Basis-Fiktionen des Handelns*, 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 1982)。汉斯·艾柏林的这部著作涉及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说情境和阿佩尔的交往团体的先天性,分析

它们如何通过自身表明一种有限存在的理性行为的意义维度。汉斯·艾柏林想要通过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改造,超越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哲学主张,避免沿着他们的套路走下去。他认为,人们总可以找出某种不可欺骗的东西作为人的最终行为调整。譬如,对自由的追求、平等的建立特别是对必死性的摄纳,这些活动尽管有限却是合乎理性地为人的最终行为调整奠定说明的根据。同时,它们是与理性的事实一起构成人的行动的虚构基础:人性的最终界限标记始终伴随理性的行为,而人的最先行动根据一定超越潜在的理论理性。艾柏林的这部著作一出来,颇得德国学术界好评,把它视为对人的有限理性及其并非有限的任务作了合理的调整。

另一部颇有趣味的著作是《碰机会的主体——法则、座架、脚手架》(*Gelegentlich Subjekt: Gesetz, Gestell, Geruest, Verlag Alber Freiburg/Muechen, 1983*)。此书探讨近代德国主体性哲学的演变过程,顺着海德格尔克服当代技术的思路,探讨把技术收回到使它得以可能的基础(座架)上。^①在艾柏林看来,原来的主体性哲学把人的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看作是自己行动的固有法则,而且奠基于技术和经济的异在规定的(*fremdbestimmte*)座架之上。如今,德国哲学把这个座架给弄没了,主体因而落入既由自我支配也由他者支配的脚手架之内。20世纪引发人类相互厮杀的两次大战,清楚告诉我们原有的主

① 海德格尔说:“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座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见“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载《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7页。进一步的分析可参阅绍伊博尔德的《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体性哲学的座架已经被置换掉了。由此,从理想交往、论证和认同的现实条件出发,人们才有可能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可能引发的新战争)导致的人类的必死性有一个清晰的反省。艾柏林试图对现实暴力的形成从人类存在总体出发作一种根据说明。^①

艾柏林这里分析的目的在于指出,为了彻底挽救启蒙精神,主体仍然有机会成就座架;原本的主体也还有可能在理性法则之下得以展示,而非所谓的主体屈服在脚手架内。所以,哲学工作者的著述作为一本“组装起来的书”(也是一种脚手架!)不仅是现时刻对人类生存作最终根据的说明,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的发言。它要抛弃上世纪以来荒唐的持续不断的逻辑,厘清关于理性的意义维度、自由的宣称、平等的建立和必死性的摄纳。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绝望必定伴随死亡的结局。

最后要介绍的是《厄运——第一哲学》(*Das Verhaengnis, Erste Philosophie*, Verlag Alber Freiburg/Muechen, 1987)。在欧洲哲学历史语境中,所谓第一哲学就是对存在最终根据的沉思。千百年来,第一哲学集中了几乎所有欧洲哲学家以形而上学为名进行的根本争论,结果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批评本身成为厄运。君不见,胡塞尔现象学的“厄运”在于力图在个人先验意识基础上最终为科学奠基,从而实现现象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理想;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厄运”则努力通过“烦”这一虚无的黑夜和存在向“此在”的敞开去探究关于人生的真理,由此确

① 对此论题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伽达默尔的“海德格尔后期哲学”,载《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459—481页);沃林的《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7—165页)。

立基础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而列维纳斯(Emanuel Levinas)的哲学“厄运”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从本源性上克服西方本体论优先地位的存在的思维，这样就不能不关涉伦理学和宗教现象学——不难理解，为什么列维纳斯明确宣布，只有伦理学才有资格担当第一哲学的重任。确实，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充满新奇然而不乏空洞说教的“狂热”时代，人们必须如此迫切地保留第一哲学的实质——也就是保留形而上学的批判。然而，这些都不约而同地走向反对海德格尔的新的形而上学，它甚至是20世纪的另一个神话。这构成了艾柏林此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小标题为“系统思维的非理性”，明确反对作为元生物学(Metabiologik)而复活的令人瞩目的卢曼(Luhmann)的系统理论的形而上学。在这里，人的非理性成为理性，因之，第一哲学的厄运变成本来的不可逃避的厄运。第三部分分别分析理性逻辑的界限、死亡逻辑的必然性和主体逻辑的制约。艾柏林的分析表明，主体的所谓死亡经过对第一哲学的改造，仍然可能倚存在康德划定的纯粹理性界限内。该书有两个附录，分别论述第一哲学在形而上学的根本图像中的被摧毁(附录1)，因而也必须设置在最后宗教里的一种新的厄运中(附录2)。

《自由、平等、必死性——海德格尔之后的哲学》(*Freiheit, Gleichheit, Sterblichkeit, Philosophie nach Heidegger*, Reclam, 1982)是由艾柏林本人从他在柏林、波恩、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弗莱堡、因斯布鲁克、帕德博恩等地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整理出的八篇可独立成章的论文组成。其中的一篇已发表过，其余均系首次发表。这八篇论文从标题来看似乎有点散乱，然而读后就会发现，它们的内容实际上相接紧凑，都与自由、平等、必死性这一共同论题密切相关。换言之，这些论文所讨论的

并不是一些松散而缺少关联的问题,而是从不同方面尝试在“自由、平等、必死性”这个题目下,重新检视近代欧洲启蒙的得失,挽回那些被人们所抛弃了的珍贵观念。

艾柏林在开篇之论“哲学作为职业”中明确指出,哲学作为职业是以哲学作为生活使命为前提的。他认为,从事哲学职业的人要坚定地持守自己的生活使命,尽管哲学的成就无不与人类的痛苦相联。这种痛苦是由被霸占了的自由、平等和必死性来决定的。哲学就是注定要同这种霸占作斗争并从而揭示人类的痛苦,然而,它在为扬弃并消除痛苦方面作出的贡献越大,那么痛苦也就越加成为哲学所期待的东西。艾柏林首先向读者大体展示了霸占的情形,其次论述处理这种霸占的哲学方法。然后,他通过几个选定的具有建设性的哲学例子说明,对于“解释学的恢复”,“方法论的重建”能提供些什么。最后,他揭示出哲学的最终目的与重建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篇“海德格尔哲学的四重亏空”讨论了海德格尔关于天、地、人、神这四维哲学的“可疑”之处,首先表明在“真理”方面的方法论亏空和在自由、平等、必死性上的事实性亏空。作者认为,真理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项,自由是主观性理论的基础项,平等是近代行动理论的特殊基础项,必死性是颠倒的现代形而上学的相应基础项。因此,它们也都是哲学的基础项。作者指出,海德格尔哲学的四重性亏空是直接伴随着我们的哲学财富一同产生的,它是海德格尔思想的阴暗面(Kehrseite),一个根本没有销声匿迹的阴暗面。

艾柏林在第三篇“人的自我持存的基本结构”中,提出五个关于人的自我持存的基本结构的论点,并尽可能加以论证。这五个论点是:(1)人的自我持存既不能从物理学也不能从人类生

物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它的基本结构更多的是作为认识和行动的准先验条件来发挥作用的;(2)人的自我持存的基本结构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指向必要的自我提高,另一方面是有意识指向可能的自我毁灭。因此,自我持存意识包含着自由意识和死亡意识的统一;(3)同自然的统一相比,自我持存意识的自由存在于一种不可避免的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幻觉中,这种幻觉来自对自由的假定。没有自我幻觉就没有人的自我持存;(4)人的自我持存和自我提高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我主张和外来灭亡的变形,表明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意识形态批判揭露自由的欺骗现象,同时维持和提升自我幻觉的必然现象;(5)哲学家们只是对人的自我持存的基本结构作了各自不同的诠释,现在的问题是要改变这些诠释,否则,从哲学家们认为的人的自我持存的基本结构中,只会引出死亡的绝对消极性。

在第四篇“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颠倒”中,艾柏林指出,技术的时代以及转向的技术只是厌恶形而上学。但是,有助于问题解决的做法显然是改变形而上学,而不是摒弃它,是“传递变换”它而不是将它视作先验的虚无。作者认为,仅仅是以厌恶为终结的那些颠倒并不新鲜。不断要求“反转”的颠倒也不是现在才有。即使那个最重要的形而上学的颠倒——康德的“反转”——也只是一种“反思”,一种人将自己视作理性动物的反思,并由此而构成一种转向,转向什么为人所有和什么不为人所有。

第五篇“自由、平等、必死性:理想的感性之维的参数”着重讨论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说情境,提出让更为根本的要求超越哈贝马斯提出的理解性、真理性、正确性、真实性这些要求并同它们相联系,亦即让理想的感性之维超越这些要求并由此与理性的最终指向相联系。作者通过分析自由、平等和必死性得出结

论说：理想言语环境的假定性以感性意义之维的假定性为基础。理想的感性之维是和理想的言语环境一起共同实施的。但是，作为它的重要的先决条件，理想感性之维必须首先暴露出来。这并不是要建立新的没有实际内容的骗局，而只是指要对那些使理性的预先推定先验化和合法化的事实进行命名。

艾柏林在第六篇“所有‘绝对的’命令事实上只是相对的？（叔本华、康德、马克思）”中认为，叔本华和马克思的最高法则的理想化最能代表康德划分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也体现出阿佩尔的调节原则。叔本华和马克思从不同的方面着眼于现实的和理想的交往关系，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自我持存的指向尤其是对提高自我持存的指向，规定着康德绝对命令和阿佩尔哲学改造的那些要求。这些要求在叔本华尤其是马克思那里看来，有可能且有必要通过具体化来加以激化。作者指出，推翻全部使人遭受贬低、屈辱、冷落和鄙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项绝对要求，它要求以一种飞跃来建立人性社会的全面的富裕。

艾柏林在第七篇“叔本华与现代论”中，把叔本华看作真正的具有现代性的启蒙哲学家。因为，一方面叔本华和马克思一起共同促成了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他们也还恰恰能为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环境和阿佩尔的交往关系优先的预先推定做出贡献。作者指出，肯定启蒙家叔本华，也就是肯定他的哲学具有康德所说的内在力。事实上，叔本华要追求的，恰恰是康德自己的哲学理想。

在第八篇即最后一篇“规范与死：回到海德格尔？”中，艾柏林指出，人类全体毁灭的“明确将临”迫切要求使海德格尔的死亡学重新结出成果。作者再次强调，只要讨论死亡问题，就一定要提及海德格尔。因为，没有海德格尔，我们就无法认识事实上

有限者终有一死而理性者并非终有一死的基本问题。对死进行规范就是使死服从于理性的事实,这一必要性又要求我们对海德格尔进行改造。艾柏林认为,哲学死亡学作为先验民俗学,虽然对经验分析的死亡学所给予的补充不完善,但却是丰富的。这个缺陷当然威胁人类的最终命运,从而有理由表明人类为什么还需要哲学——就是为了能够排除来自所谓现实的全部阻挠而贯彻自由、平等以及倾向于消除必死性。

近代欧洲启蒙哲学催生出现时代的技术思维,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大略而言,海氏的批判越过康德先验的主体性哲学,暗示着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神学的新生。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现时代的技术化思维,使人的任何本真存在和本质被扭曲,而这些东西在中世纪时甚至曾以基督教神性的比喻得以充分的展示,使人从一开始就免遭单纯的物质化,免遭纯技术的操纵。^①

上世纪 80、90 年代,就海德格尔关于克服现代技术统治的话题,欧洲学术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针对法国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极力瓦解启蒙理性的那种因噎废食的主张,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热情持守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在这场争论中成为理性的“最后的守望者”。而意大利的哲学家艾柯(Umberto Eco)则似乎较为接近海德格尔,试图从中世纪哲学中开掘出应对现时代技术统治的思想资源。艾柏林本人对启蒙的理性遗产采取积极而又审慎的态度,明确指出:“至于技术如何难以估价这一遗产,形而上学又是如何截然不同于海德格尔所评

① 参阅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6页。